

乾嘉时期苏州藏书活动的万千气象^①

黄镇伟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乾隆、嘉庆近百年间,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一批学术大家聚居苏州,以藏书为媒介,学术为纽带,形成气氛浓烈的考据学研究中心,书肆林立,藏书家遍布,代表人物有黄丕烈、周锡瓚、袁廷椿、顾之逵;中坚人物为黄丕烈,其独到地提出了“书贵有源流”的藏书宗旨,以藏书题跋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

关键词:苏州;藏书;历史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6)03-0116-05

DOI:10.16101/j.cnki.cn32-1749/z.2016.03.024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书籍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物。人生世间,光阴百年,手经千事,目接万物,日久心中必有所爱。对书卷的倾情钟爱,不仅有关社会风尚,更关乎个人性情。藏书家能从书卷中感知纸润墨香,如清代常熟藏书家钱曾所说:“闲窗静坐,炉香郁然,览兹墨妙,是正书中一二讹字,觉人世间荣名利养之乐,罕有逾于此者。”^{[1]115}这种心情,非有独钟,实难体味。藏书性情的培养,有赖于来自家族和地方的文化熏陶。历史上,藏书家大都兼有学者身份,同时参与刻书。所以,藏书家群体一旦形成,就成为一座城市色彩鲜明的文化名片。

苏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书香雅尚绵延千年。乾隆、嘉庆近百年间,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其标志是考据学的辉煌,一大批学术大家联袂崛起。其时,苏州学者云集,如惠栋、毕沅、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段玉裁、江沅、江藩等。乾隆五十四年正月,钱大昕在苏州主讲紫阳书院,当时顾千里、钮树玉、瞿中溶、顾莼、朱骏声等一批吴中文士俱在紫阳书院就学。这批学者聚居苏州,无一不是以藏书为媒介,学术为纽带,彼此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切磋,形成气氛浓烈的考据学研究中心。考据学研究需要丰富

的古书古本的支撑,这又极大地促进了苏州藏书刻书活动的繁荣。这时的苏州,贩书之肆林立,藏书之家遍布,书业繁荣。潘祖荫在为《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所作“序”中归纳了康熙至道光间苏州藏书事业的变迁,他说:“吾郡藏书家,自康雍之间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后,嘉庆时以黄尧圃百宋一廛、周锡瓚香严书屋、袁寿阶五砚楼、顾抱冲小读书堆为最,所谓四藏书家也。”^[2]文中所说“四藏书家”即指黄丕烈、周锡瓚、袁廷椿、顾之逵,其中的中坚人物为黄丕烈。黄丕烈与三人为书友,亲密无间,故自称为“藏书四友”,并请钱塘陈鸿寿绘《藏书四友图》。

苏州城中的藏书四友

藏书四友中,周锡瓚年最长。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黄丕烈在《姚少监文集》跋中说道:“香严喜藏书,家多秘本,先余数十年而收藏者,今年已七十外矣……二十年来,可谓同志之友矣。向时尚有抱冲、寿阶,今两君皆先后下世,唯周丈与余,一老一艾,孜孜于故纸堆中求寻活计,可喜亦可忧也。”^{[3]161}

周锡瓚(1742—1819),字仲涟,一字漪塘,号香严居士。吴县人,住阊门外马铺桥。藏书楼名水月亭、

收稿日期:2016-04-11

作者简介:黄镇伟(1954—),男,江苏吴江人,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图书文化学。

①本文为作者2012年在台北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授课时所编讲义《〈尧圃藏书题识〉选读》的“前言”,发表时增加了标题,并对部分文字做了增订。

漱六楼,藏书数万卷,多宋元刊刻及名钞秘本,手自讎校,寒暑不辍。其去世前一年尚用半年时间校勘毛氏影抄宋本《集韵》,全帙丹黄钩贯,窜易鲁鱼,字皆细若蝇头。故于古书今刻,洞悉源流变易,黄丕烈誉为“吾侪巨擘”,所以每得一书,必定要借水月亭藏秘本比对,经他一语审定,方始放心。读未见书斋藏残宋本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字画方板,是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宋刻宋印,原是水月亭旧藏,周锡瓚转赠,黄丕烈为此赋诗答谢:“元抄藏自我,宋刻赠由君。两美此时合,一书何地分。”^{[3]87}其时,学界素知周锡瓚的藏书富甲吴中,且博闻强识。故毕沅编《史籍考》、阮元辑《十三经校勘记》,经常寓书以疑义咨访,并商借所藏善本藉资采择,所求多能得到满足。

道光元年(1821),周氏季子周世敬辑《小通津山房文稿》,收录周锡瓚诗文88篇,大多为其晚年作品,很多为藏书校勘题跋。《文稿》中记录了他与当时学者藏家的交往:与王鸣盛、钱大昕、吴省兰、孙星衍、段玉裁,同里吴泰来、江沅、陈鱣、黄丕烈、钮树玉、顾之逵等经常借读藏书,互相考证,其中尤以段玉裁为最。如《集韵校本跋》中谓:“汲古阁毛氏影宋钞本,余向年所藏,已归海宁查小山名有圻家。此书段茂堂先生曾借去精心校勘,可谓毫发无遗憾。”^{[4]302}《说文系传校本跋》:“余先将段茂堂先生所校本(即顾抱冲购毛氏钞本)校过,补缺刊误,稍为是正。”^{[4]302}《经典释文校本跋》:“金坛段茂堂先生,当代经师,笺注《说文》,急欲借读。余遂检出付往。茂堂托毗陵臧在东精心细校,并将宋刊诸经本参互改正。自书于通志堂刻本之上,将原书归还。”^{[4]301}段玉裁则在周锡瓚的《七袞寿序》中记道:“余自壬子居吴,借书以读,所恃惟周子。周子非仅以聚书鸣也,寔能读书。”^{[4]312}对他的治书之学给予很高的评价。

周锡瓚歿后,遗书由各子分藏。其中季子周世敬(号谢庵)一生勤于辑录古书,黄丕烈把他比为毛晋之子毛扆,皆能继承父业。

顾之逵(1753—1797),字抱冲。元和人,廪贡生。顾千里从兄,室名小读书堆。瞿中溶在《挽亡友顾抱冲茂才》诗中这样描写他的藏书好学:“嗟嗟顾君好读书,百万牙签皆玉轴。宋刊元印与明抄,插架堆床娱心目。”^{[8]552}乾隆五十八年(1793),他从苏州故家觅得宋本《列女传》,委托顾千里负责校讎,三年后刊行。海宁藏书家吴騫曾多次过访小读书堆,知道抱冲正在校刊宋本刘向《列女传》。当书刊成,顾之逵已经

病重,仍不忘嘱咐从弟千里寄书。吴騫见书思人,专门写下跋语。^{[9]233}可见藏书家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彼此友谊。

袁廷椿(1763—1809),字又恺,号绶阶。吴县人,诸生。向居金昌亭畔,枫桥有别业名渔隐小圃,中有红蕙山房、五砚楼。红蕙山房为书斋,因阶前种有徐乾学留植于金氏听涛阁下之红蕙而得名。五砚楼是藏书之所,因珍藏祖传明袁敬砚、袁褰的谢湖草堂砚、袁褰的列岫楼砚,以及后得王昶所赠元袁桷清容居士砚、谷虚先生廉石砚等五砚而筑。楼中蓄书万卷,多宋元刻本及精抄本。廷椿日坐楼中,青灯黄卷,沉潜于书香墨色之中。袁廷椿为学专精汉学,与当时在苏州的硕学钱大昕、段玉裁、王昶、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江声、顾千里、钮树玉等都相与鉴别古籍,切磋问学。在他身后留下的《红蕙山房集》中,留有他们这种学术交往的印记。

由于他痴迷藏书,不治产业,家道中落。为谋生计,奔走于江、浙间,不幸在杭州染病,归家旋即去世。同道哀其早逝,恋书之情未酬。顾千里过其故居,眼见人去楼空,心哀而赋《月下笛》:“魂归白昼常闻哭,想只恋清箱未死。”清箱,旧指世传家学。袁廷椿死后尚不忘吴中袁氏藏书刻书的家风,一个“想”字,真切地道出藏书家对藏书家的理解和哀悼。

袁廷椿身后子孙不能守,藏书星散,大半为吴中藏书家所得。

黄丕烈在藏书四友中下世最晚,故在周锡瓚的挽诗中,他写下了这样伤感的诗句:“忘年结契更忘形,导我藏书示典型。三老(周锡瓚、张焘、段玉裁)风流成阒寂,四家(苏城藏书四家)文采剩伶仃。”^{[4]313}

在乾嘉极盛时期,黄丕烈广储古书,宋元精品,琳琅满目,富甲天下。而于古书版刻的先后异同,传授源流的典实掌故,靡不赅贯,巍然为书林的一大宗主,举世推挹之。所以,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三“藏弃卷”中评介说:“昔人谓乾、嘉以来,藏书家,当以丕烈为大宗,而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允矣。”^{[5]341}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尧圃。吴县人。他虽身居苏州繁华之邑,却一生无声色犬马之好,独钟情于书,心甘终老于治书之业,诚如他的好友、同为藏书家的张燮所说:“吴人爱花复爱酒,否亦声华竞驰走。君独修然抱一编,世味纷华不能诱。”^{[10]593}

嘉庆六年(1801),黄丕烈在举人大挑中名列一

等,以知县用。但他仅纳资捐得一个兵部主事的候补官衔,就返回苏州,终身没有出仕。藏书、校书、刻书,成为黄丕烈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主要内容,王芑孙在《陶陶室记》中所形容的:“积晦暝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正是他这种生活和追求的真实写照。

黄丕烈的藏书室名号甚多,有士礼居、求古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室、百宋一廛等,充分反映出他终生泛游书海的情趣。

古代读书人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往往会养成一些堪称雅尚的嗜好,如爱书者为书痴,喜墨者称墨癖,耽诗者成诗囚。黄丕烈爱书到痴绝的程度,每岁邀请同道好友举行祭书仪式是其重要标志。据诗文记载,祭书活动嘉庆年间先后在悬桥巷读未见书斋及士礼居举行,其时陈书千卷,香炬如椽,石湖菱藕,供奉虔诚。参加祭书活动的,都是江南著名的文化人,他们雅集一堂,谈论的中心自然只是那些散发清香的古书。所以,祭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术与藏书交流。每得好书,黄丕烈也要庆祝。嘉庆八年春,他在书肆偶得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雕刻精美,虽仅8叶,却历经明朱承爵、项元汴,清初何焯等江南著名藏书家的鉴藏,为罕见的善本。当年夏天,兴奋的黄丕烈就大张旗鼓地邀请李福、瞿中溶、顾莼、袁廷枬等11位同仁斋中雅集,以“尧翁属题唐女郎鱼玄机诗”各字为韵赋诗,杭州余集为作“唐女郎鱼玄机小影”。同时苏州名流潘奕隽、石韞玉、王芑孙等,个个吟诗,人人铃印,风流雅韵,久传吴中。

黄丕烈在《刘子新论》的题跋中自述:“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3]97}所以他每见古书必收,有的一书竟有三四本重复者。以致有人质疑是夸多斗靡。黄丕烈在《砚笺》题跋中这样回答:“取其书之尽美又尽善也”^{[3]92},足见他的藏书宗旨。

藏书题跋与佞宋之风

清代,苏州私人藏书家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他们的藏书活动之丰富史无前例。该时期除藏书、刻书外,还出现了多部在中国图书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藏书题跋,如毛晋的《隐湖题跋》、钱谦益的《绛云楼题跋》、黄丕烈的《尧圃藏书题识》、顾千里的《思适斋

书跋》、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其中以黄丕烈的《尧圃藏书题识》最为知名。

藏书题跋,一般是指藏书家题写在藏书卷末的亲笔文字,以说明该书的版本、卷次、作者、内容、体例、价值、得书经过和授受渊源等。藏书题跋与图书提要有相近之处,而其起源正与藏书印一样,是唐宋文人书画题跋的近亲。藏书题跋多直接出于藏书家之手,其侧重于反映他们得书的感情,所以较之提要,没有一定格式,行文更为自由抒情。内容往往以记录版本鉴定结果、藏书印文、藏书的授受渊源、藏书家的交往及书林逸事为主,所以对古代的藏书研究、文化传播状况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黄丕烈一生屏去世事俗务,坐拥书城,将自己的全部才情学识倾注于书间卷里。他的藏书题跋,光绪间潘祖荫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清末缪荃孙复辑为《尧圃藏书题识》,民国王大隆再辑《尧圃藏书题识续录》《尧圃藏书题识再续录》。各本共辑集八百余篇,黄氏藏书题跋基本囊括殆尽。展卷摊读,精识盈目,卓见满纸,书趣横溢。其题跋常于文末兼记眼前景物,以衬托自己得书校书后的欣喜舒慰之情。如跋《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在记述自己耗时20日校毕此书后,文笔一转,转出这样的至情文字:“时春雪大下,晓寒逼人。窗外山茶花红英点白,佳致嫣然,亦自可爱。惜山僧招我探梅,不能作灞桥驴背上人,恐诗思亦复涩耳。”^{[3]28}宁坐寒窗校书桌,不赴踏雪探梅路,此翁爱书的风流雅致跃然纸上。

除了情文并茂以外,更重要的是,黄丕烈在题跋中阐述自己的藏书思想,梳理图书的传授源流,素为学术界推崇,享有“黄跋”的名声。

藏书是一件算得上风雅之事,但黄丕烈酷嗜藏书并不仅仅为风雅。他在《刘子新论》的题跋中说:“读书在广见博闻,余谓藏书之道亦然。藏而能读,非见闻广博,不足以奏其功焉。”^{[3]97}这里所说的“奏其功”,就是能够准确鉴别图书的来历和价值。为此,黄丕烈独到地提出了“书贵有源流”的藏书宗旨。

所谓源流,是指图书产生后传播流通的情况,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你看到的这部图书的身份。图书在流通中会产生使价值发生变化的情况,主要有有否散佚或抄补,何人据何本抄补;有否校记跋语,何人据何本校刊,跋语出自谁手;经过何人收藏,其人鉴别欣赏水平又如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属于图书的身份问题而需要弄清。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版本学命题,

也是黄丕烈在藏书活动中刻意追求的学术目标。

黄丕烈藏清初钱曾述古堂旧藏宋刻《历代纪年》十卷,此书流传绝少,知者颇希。《读书敏求记》卷二著录称:“始之以正统,次之以封建僭据,再次之以盗贼夷狄道里,而后以历代年号终焉。”^{[1]35}似乎首尾完善,其实,存九卷,首缺第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说有绍兴七年作者自序。卷末又附有《最国朝典礼》五叶,这些钱曾都没有在题录中交代。黄丕烈一一加以查考,在题跋中逐条标明。又钱曾曾藏旧抄本《梁公九谏》,《读书敏求记》著录,但无一字跋语。黄丕烈得之,根据卷中“辨之”“姑苏吴岫家藏”二印,确定其价值,指出二人沈与文、吴岫都是明嘉靖间苏州藏书家,则抄本的年代应在其前,十分珍贵。

尧圃题跋还详记在苏州书铺收购古书的经过,除了城隍庙前五柳居、山塘萃古斋外,还有胥门胡鹤经义斋、玄妙观前学山堂书坊、玄妙观东闵师德堂、玄妙观前墨林居、阊门横街留擘堂、阊门书业堂、阊门文秀堂书坊、金阊门外桐泾桥头书铺芸芬堂、醋坊桥崇善堂书肆、葑门大观局等数十家。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题跋中说,嘉庆十四年,正逢皇上五十万寿,各省官员大备贡品,书籍古玩亦在采办之列。^{[3]36}苏州是江南都会,珍物云集。城中应时开出贡局,经营书籍古玩,葑门大观局即其一。大观局由葑门彭、宋两家合开,掌柜都排行老三,彭三号朗峰,宋三号晓岩,皆为诸生。又记常熟书贾携宋刻残本《圣宋文选》,要求以新刻《十三经》交换。当时阊门书业堂正新翻汲古阁《十三经》,每部售钱十四两。这些都是苏州书业的重要史料。

清以来,藏书界盛行佞宋之风,究其由来,则与苏州藏书家有莫大的关系,或者说完全是苏州藏书家煽起的。从钱曾的《述古堂宋版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江标《宋元本行格表》、曹元忠的《笈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等宋元本书目题跋中,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这种风尚扑面而来。

藏书偏好宋元刻本的风尚,始于明末清初,常熟藏书大家钱谦益、毛晋倡导于前,乾嘉中苏州黄丕烈继之于后,于是佞宋好古之风盛行。然据记载,明代藏家已喜好宋刻,最著名的就是元赵孟頫旧藏宋刻两《汉书》的故事。明太仓王世贞卖掉一座庄园,从长洲陆完处购得这两部宋刻《汉书》,成为自己藏室中的第一宝。他描述此书桑皮纸,白洁如玉,四边宽广,字大

者如钱,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前有赵孟頫像。后流入新安富商之手,钱谦益又用千二百金赎回,收藏二十年,崇祯十六年又以千金转让四明谢三宾。书去之日,钱谦益十分难过,形容那时的凄凉景色,竟然与当年李后主挥泪去国之情景约略相似。更有甚者,时有李维柱,对钱谦益说,如果得到赵孟頫藏《汉书》,每日焚香礼拜,死则当以殉葬。

清初,钱曾藏书独嗜宋本,其友冯班戏称:“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佞宋之志,始终挥之不去。黄丕烈更公开以“佞宋”自我标榜,在《三历撮要》题跋中称:“余佞宋,故所藏书苟为宋槧,虽医卜星相,无所不收。”^{[3]85}在《史载之方》题跋中,他再次肯定“余之惜书而不惜钱,其真佞宋耶!诚不失为书魔云尔。”^{[3]79}藏书领域里的尊古之风达到极盛。

为何有这么多的藏书家青睐宋元旧本,明苏州藏书家张应文在《清秘藏》卷上“论宋刻书册”条中曾经正面叙述过:“藏书者贵宋刻,大都书写肥瘦有则,佳者绝有欧、柳笔法。纸质匀洁,墨色清纯,为可爱耳。若夫格用单边,间多讳字,虽辨证之一端,然非考据要诀也。余向见元美家班、范二《书》,乃真宋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者。无论墨光焕发,纸质坚润,每本用澄心堂纸为副,尤为精绝。”^{[6]217}

其实,随着时代的推移,传播中的损耗,附着在书籍上的文物性和文化含量在不断增加,时代较早的宋元旧本自然就成为藏书家眼中的稀世珍宝。且宋本刊刻年代早,能保存古书面貌,这在校勘和考据学上,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宋元本也有质量差的,即使是黄丕烈,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未无原则地一味盲目崇尚。

黄丕烈于书,最爱宋版,每遇之,“无不致之以为快”,并自署“佞宋主人”。嘉庆七年(1802),他迁居城东悬桥巷,专辟一室珍藏前后收集的百部宋本,名之曰“百宋一廛”,编撰《百宋一廛书录》,并请顾千里撰《百宋一廛赋》,自己作注,详述宋本源流,传为书林盛事,更为后世奉作鉴赏的圭臬。

清代乾嘉时期,一代学者先后以毕生的精力才智,孜孜于对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以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考据学的研究,首先在于恢复古代文献的本来面貌,校勘古籍自然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于是,学者藏家竞起刻书,至成一代风尚。校勘古籍除了彰显学术以外,还能以保存古籍之功传名于世,这

一点尤为藏家所看重。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中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7]256}

张之洞所说的“吴之黄”就是黄丕烈，更准确地说他校勘《士礼居丛书》所为。黄丕烈曾收得宋本《仪礼》注、疏各一本：严州经注本和景德单疏本。“仪礼”又称“士礼”，遂以“士礼居”名斋。嘉庆中，黄丕烈从家藏宋本中遴选20种，请好手精心影写重刻，并委任顾千里专事校勘。刊行后产生了比汲古阁影宋抄本更大的影响。严州本《仪礼》亦被选入丛书，其字画精整，神韵飞扬，不亚宋刻，行家称为是真迹下一等的善本，完全是名副其实的。

“民国”二十九年，吴县王大隆在《尧圃藏书题识再续录》的跋语中评价尧圃及其藏书题识：“鉴别精，搜罗富，每得一书，必丹黄点勘，孜孜不倦，务为善本

留真，以待后人之研讨。存古之功，自不可没。至题识，多率意信手之笔，如日记、如琐录，而性情真挚，跃然纸上。遗事坠掌，足资多闻。固录略之别子而书林之雅谈也。”^{[3]384}推崇之意溢于言表。

参考文献：

- [1] 钱曾. 读书敏求记[M]. 丁瑜, 点校.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 [2] 汪士钟. 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M]//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9.
- [3] 黄丕烈. 黄丕烈书目题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4] 周锡瓚. 小通津山房文稿[M]. 周世敬,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5] 陈登原. 古今典籍聚散考[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3.
- [6] 张应文. 清秘藏: 卷上. [M]. 上海: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47.
- [7] 张之洞. 书目答问补正[M]. 范希曾, 补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8] 瞿中溶. 古泉山馆诗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9] 吴騫. 愚谷文存[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0] 张燮. 味经书屋诗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Spectacular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in Suzhou in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 Periods

HUANG Zhen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 Periods, which lasted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were the heyday of the ancient acade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A group of academicians gathered together in Suzhou and established the textology research center characteristic of a strong atmosphere by taking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as a medium and academia as a link.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both book stores and bibliophiles all over Suzhou. And there were many representatives such as Huang Pilie, Zhou Xizan, Yuan Tingchou, and Gu Zhikui. The core figure was Huang Pilie, who uniquely proposed the purpose of book collection that valuable books had their origins, and whos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inscriptions textology have a glorious p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Key words: Suzhou; book collection; history